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丁小丽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秩序之护符的孔教儒家伦理进行了猛烈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新青年》传播的制高点,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谱写了华美篇章。

[关键词] 《青年杂志》;《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0)02-0077-05

谈起“五四”,有学者将其形容为“像赶庙会”,^①各派言论竞相展现。而为这场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宣传载体之一——《新青年》,自然也绕不开人们关注的视野。《新青年》,其前身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它是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从第2卷1号起,改称《新青年》。一份杂志的创办,何以标志一场运动的兴起,并伴其发展?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青年杂志》的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弱点,辛亥革命后,反动复古逆流粉墨登场。1912年10月,张勋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宣扬欲存中国,非赖孔教。10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②尊孔复古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同年12月,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君主专制,孔子之道仍被奉为万世师表。

面对国家的颓倾之状,一些革命志士记取失败的教训,继承革命精神,为探索新的救国方案而努力。陈独秀从救亡的愿望出发,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广大国民脑筋不清,析理不明,对革命如同观对岸之火,熟视无睹,为根本原因。在陈

独秀看来,救中国,建共和,赖以思想革命为先导,但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而改造国民思想主要在于改造青年的思想,于是,他疾呼要创造出那“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的自觉奋斗的青年。他还明确指出:青年在“新鲜活泼”与“陈腐朽败”间进行抉择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以求独立之人格;“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以适环境之生存;“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以抗恶俗之社会;“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以冀图存之世界;“实例的而非虚文的”,以利现实之生活;“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索宇宙之事理,^[1]为沉闷民族的崛起作最后之哀鸣,从而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谋幸福。在这种思维路径下,《青年杂志》应运而生。

《青年杂志》创办者以“改造思想为本志天职”,力图发起一场解除人们精神枷锁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指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但启蒙因救亡的任务而起,所以对时政的批评,不可能脱离新文化倡导者

^①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在《白序》中指出:“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参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注释:“宪法草案”指《天坛宪法草案》,该草案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们关心的范围。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反思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1920年9月8卷1号那篇标志着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谈政治》外，在此之前，“政治”话语始终未脱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视域。如陈独秀在1916年10月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写道：“今日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国家处武人乱政、社会腐败、游民盗贼充斥之状，“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3]

1918年7月，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关于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正如陈独秀所说“怎应该装聋推哑呢？”^[4]可见，发轫于20世纪第15个年头的的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在对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进行严肃思考后的慎重选择，它对此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新青年》与前期新文化运动

以1919年“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和“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5](P699)]的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阶段，“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战士们高扬的两面鲜艳的旗帜。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为主要内容。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开篇之作《敬告青年》中强调：科学与人权，如“舟车之有两轮”，而“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的“人权”即“民主”。在当时的先进分子看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改变贫穷落后，摆脱奴役地位，挽救颓势中国的重要力量。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的世界”。所以“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在此宗旨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揭橥“民主”和“科学”大旗，将其作为批判的武器，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批驳。

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仍属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主要指平等人权、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等资产阶级民主观以及在陈独秀看来是“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提倡“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的民主制度。^[7]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科学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8]他在此文中介绍的社会科学，主要是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在新文化运动者看来，“民主、科学”都是“新”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与中国封建礼教等“旧”文化截然相对。兴民主，必须破专制；擎科学，必须抑迷信；倡新必须弃旧，“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9]所以陈独秀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

破旧，主要指破除为封建旧秩序作论证和辩护的孔教之旧。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护符和判断是非标准的孔教，阻碍了社会进步，违背了社会经济生活。首先，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把尊孔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目的，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11]陈独秀认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12]其次，反对把孔子写进宪法。他们认为孔教，注重别尊卑、明贵贱。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既然提倡共和，那么就必须反对把孔教立宪。李大钊强调，孔教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入宪法”。^[13]此外，新文化同仁们还认为，尊孔必然导致思想不明，学术专制，阻塞民智。吴虞指出：“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14]所以儒教必须革命，儒学必须转轮。

新文化倡导者们不仅反对孔教，与之相关的一切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妇女问题等都成为其关注的对象。陈独秀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道德观念，应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旧道德不适于今世之生存。认为旧道德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根源所在，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都是从旧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都是旧道德助长的，要消灭黑暗，达到光明，必须主

张新道德。吴虞抓住儒教的“孝悌”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猛烈攻击，认为孝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关系连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15] 吴虞非儒的言辞激烈，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建设个人本位的自由精神，一直是《新青年》所提倡的。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主义，推崇其“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主张。^[16] 《新青年》撰稿者关心的女子问题涉及教育、恋爱、婚姻及女权运动等，他们把女子教育与社会兴衰联系起来，认为“其教育遂亦不仅系于一家一姓之兴衰，而系于社会国家之治乱”；^[17] 认为自由恋爱之婚姻，“于理论上为至善之制度，于事实上为必至之境界”。^[18] 李大钊把妇女问题上升到打破专制制度的高度，指出“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女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9]

在陈独秀等看来，作为反封建武器的科学，主要指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反对神权，反对愚昧、迷信、盲从和武断。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科学有明确的表述：“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新文化战将希望通过提倡科学，以反对上帝创世的谬论，解除宗教对人们的束缚；他们痛恨那些脱离实际的空话、废话和鬼话。认为要根除这些弊病，惟在科学之兴；他们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对“天幸、天罚”的天命观进行了驳斥，认为大千世界没有神灵主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予以解释；他们反对迷信活动，主要是把其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他们普遍认为，迷信导致国灭，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易白沙指出：“自古诸族，但有以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国者”。^[20] 鲁迅表示：“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的传言，是全不对症”；中国需要的是“这些鬼话对头的科学”，而“不是皮毛的科学”。^[21]

民主和科学的内容，需要新的文学、文字形式来表达，于是引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内容：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提倡白话文，指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此后，《新青年》从1918年1月的4卷1号起，改用白话文，以求“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

的野蛮款式”。^[22]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以“不容他人匡正的态度”，提倡文学革命。他指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他表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3]

在《新青年》的引领下，文学革命在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等诸多方面均取得可喜的成就。小说方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被誉为新诗的奠基之作；戏剧文学方面，陶履恭、胡适和罗家伦，分别翻译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等。

三、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走向现实，给那些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可能。李达写道：“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的中国革命，或许有采用劳农主义直接行动的可能性”。^[24]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摧凌的中国劳苦大众，“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25] 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他相信俄国革命必然造成20世纪世界文明的大变动。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新青年》逐渐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的阵地。1919年1月，《新青年》5卷5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两篇政论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写道：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是不可遏止的潮流，只能迎，不能拒；认为Bolshevism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是列宁（Lenin）的功业。李大钊成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拓荒者，《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耕耘的园地。1919年5月，该刊6卷5号（由李大钊主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

专号，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奋斗生涯》、《马克思传略》，其中最醒目、理论价值最高的当属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到6卷6号）。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它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文中，李大钊还就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形态作了基本的正确阐释。

此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占据了《新青年》阵地的制高点。先进知识分子们逐渐走出前期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狭隘范畴，走上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这是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26]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书斋里的学说，只有和人民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发表了大量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如《欧美劳动问题》、《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劳动神圣与罢工》等。而1920年5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7卷6号，则开辟“劳动节纪念号”，内容涉及国内外工人运动、工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工资等。有关国内工人劳动状况的文章约占本号的三分之二，这些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新青年》成为该组织的机关刊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宣传“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他的、咒骂他的，欢迎他的，恐怖他的，都不能不认识他的价值”。^[27]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9卷6号后停刊。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瞿秋白任主编，共出9号，后5号由于拖期现象，通常被称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在北伐战争正式开始的背景下，

《新青年》停刊。这一时期，《新青年》发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论述科学与人生观、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方面的文章；开辟了“共产国际”、“国民革命”、“列宁”、“世界革命”等4个专号，介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其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因为他们“同在一条反革命联合战线”；^[28]^[P14]宣传建立统一战线，^[29]^[P16]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宣传农民对于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中国的农民群众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等等。^[28]^[P11]

总之，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它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四、余叙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切中时弊要害，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需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主要是根据孔教之道不适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原则，反对那些禁锢人们思想、为旧政治辩护的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是反对孔子自身，也不是否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如果认为反对孔教即为反对一切传统，就是在孔教与传统文化和国学间划上绝对的等号，这是不对的。易白沙指出，孔学仪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而“中国古今学术之概况，有儒家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三者混成，是为国学”。^[30]不管他对国学的界定是否准确，但至少向我们表明孔学不等于国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就连对孔家店攻击猛烈的吴虞，也称“孔、孟之书，未常无公平之理”。^[31]李大钊指出：“余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

^①《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创刊到改为《新青年》后，于1922年7月停刊，期间经历了五次迁址：1917年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从3卷1号起由上海迁往北京大学续办；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军警追捕，回到上海，《新青年》也由北京迁往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1923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1921年4月，《新青年》编辑部迁移广州；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为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于9月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即再次迁移上海；由于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捕、没收《新青年》印刷品并逮捕陈独秀等人，1922年7月《新青年》杂志被迫重迁广州。

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3](P247)}陈独秀指出：“儒家属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非非全体。”^[32]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文化运动者们立志破除的是孔教中束缚人性发展、不合社会进步的部分，而不是全盘反传统。

不过，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明显的弊端：新文化领袖们从文化的角度，从改造国民性的愿望出发，妄图通过唤醒民众的自觉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15](P664)}离开根本改变产生封建思想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和有限的宣传，不但无法拯救灾难泥潭中的中华民族，甚至连国民性的改变也会落于空谈。新文化倡导者们妄图通过批判儒学礼教，以建立“西洋式之国家，西洋式之社会”，岂不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他们在对封建伦理进行决绝的批判时，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西方学说，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进行辩证的分析。在“好”与“坏”的评价上，存在形式主义和绝对化倾向。

另外，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加以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中断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发扬，从而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拓展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识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33]而“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是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的共和政治“要用他来造成多少幸福，简直是妄想”。^[34]所以救亡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使启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认识得到进一步加深。

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救亡压倒启蒙”、“文化断层”等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争论虽没有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般激烈，但一些不切历史实际的论说仍屡见不鲜。因此，遵循历史唯物史主义的根本方法，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新文化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青年杂志, 1 卷 1 号.
- [2] 记者. 通信[J]. 青年杂志, 1 卷 1 号.
- [3] 陈独秀. 我之爱国主义[J]. 新青年, 2 卷 2 号.
- [4] 陈独秀.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 新青年, 5 卷 1 号.
- [5]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6] 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 新青年, 6 卷 1 号.
- [7] 陈独秀. 宪法与孔教[J]. 新青年, 2 卷 3 号.
- [8]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J]. 新青年, 7 卷 5 号.
- [9] 汪叔潜. 新旧问题[J]. 青年杂志, 1 卷 1 号.
- [10] 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 新青年, 6 卷 1 号.
- [11] 易白沙. 孔子平议(上)[J]. 青年杂志, 1 卷 6 号.
- [12] 陈独秀. 复辟与尊孔[J]. 新青年, 3 卷 6 号.
- [13] 李大钊全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4] 吴虞.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J]. 新青年, 3 卷 4 号.
- [15] 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 新青年, 2 卷 6 号.
- [16] 胡适. 易卜生主义[J]. 新青年, 4 卷 6 号.
- [17] 陶履恭. 女子问题[J]. 新青年, 4 卷 1 号.
- [18] 刘延陵. 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J]. 新青年, 3 卷 6 号.
- [19] 李大钊. 战后之妇人问题[J]. 新青年, 6 卷 2 号.
- [20] 易白沙. 诸子无鬼论[J]. 新青年, 5 卷 1 号.
- [21] 侯(鲁迅笔名——引者加). 随感录三十三[J]. 新青年, 5 卷 4 号.
- [22] 钱玄同. 尝试集序[J]. 新青年, 4 卷 2 号.
- [23]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 2 卷 6 号.
- [24] 李达. 讨论社会主义并致梁任公[J]. 新青年, 9 卷 1 号.
- [25] 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6] 陈独秀. 新青年宣言[J]. 新青年, 7 卷 1 号.
- [27] 李守常. 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J]. 新青年, 9 卷 3 号.
- [28] 新青年. 季刊第 4 期[J].
- [29] 新青年. 不定期刊第 4 号[J].
- [30] 易白沙. 孔子平议(下)[J]. 新青年, 2 卷 1 号.
- [31] 吴虞.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J]. 新青年, 3 卷 4 号.
- [32] 陈独秀.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J]. 新青年, 6 卷 2 号.
- [33] 李守常.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J]. 新青年, 9 卷 6 号.
- [34] 陈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J]. 新青年, 8 卷 3 号.

责任编辑：张楠